

百人百部



雲南文庫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中国竹文化

何明等/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百人百部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中国竹文化

何明等/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竹文化 / 何明, 廖国强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2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ISBN 978-7-222-08584-8

I. ①中… II. ①何… ②廖… III. ①竹-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S79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4009号

责任编辑: 谢学军

美术编辑: 王睿韬 刘雨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名	中国竹文化
作者	何明等著
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650034)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650091)
电话	0871-4113185 0871-5031071 5033244
网址	www.ynpph.com.cn http://www.ynup.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market@ynup.com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7.875
字数	378千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8584-8
定价	75.00元



作者小传

何明，博士，云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兼任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泰国清迈大学社会科学及可持续发展区域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开放时代》等学术期刊编委等职。

迄今为止，在《民族研究》、《哲学研究》、《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理论版）、《学术月刊》、《文史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重要学术报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登；出版学术专著7部；曾获第二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学术奖励多项。

近期代表性论文有：《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载于《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学术范式转换与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载于《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回到生活：关于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问题的反思》（与洪颖合著，载于《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问题意识与意识问题》（载于《学术月刊》2008年第10期）、《艺术人类学的视野》（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略论》（载于《思想战线》2009年第1期）。

近期出版的学术著作有：《中国竹文化》（与廖国强合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云南十村》（与卢成仁等合著，民族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变迁的符号表征》（与吴晓等合著，民族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主编有《新民族志实验丛书》（10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至2009年5月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10部，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艺术人类学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中国边境民族的流动与文化动态》（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REVIEW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SOUTHWEST CHINA（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等。

目前正在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边疆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西南地区部分”并担任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人类学概论》并担任首席专家。曾获第二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学术奖项和“全国自强模范”、“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等省部级荣誉称号。

作者小传

廖国强，1966年10月生，白族，现为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编审、副主编。主要从事竹文化、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在《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竹楼：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质点》被《新华文摘》1996年第11期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3部（合著）。作为课题负责人组织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共青团中央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专家提名奖（二等奖）、云南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云南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云南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9年被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授予全省宣传文化系统第二批“四个一批”人才称号。

《云南文库》编辑说明

《云南文库》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编辑出版《云南文库》是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是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是树立云南文化形象、提升云南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有共性，还有很强的地域性。一国有一国之学术，一方有一方之学术。学术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智慧的结晶，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云南虽地处边疆，仍不乏丰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尤其明清以来，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日臻密切，省外名宿大儒进入云南的代不乏人，而云南的文人学士也多有游宦中原者。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云南的文化学术遂结出累累硕果，文化名人辈出，如杨慎、李贽、李元阳、师范、王崧、方玉润、许印芳等，其总体集中性的代表成果是《滇系》和《云南备征志》。至清末，云南学子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留学，成为云南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改造社会和推进云南文化学术发展的中坚。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云南的学术成果并未为内地所认知。更有甚者，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在全国征集历代遗书，云南巡抚李右江得到云南先贤的著述，但害怕其中有什么不恰当的内容，竟私藏起来不上报，使得《四库全书》仅从它处收录了3种云南人著述，成为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辛亥革命后，云南学人痛感地方文化学术之不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由云龙、周钟岳、李根源、方树梅、秦光玉等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云南学者倾力收集整理云南文献，于1914年至1923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初编，共152种1064卷，及不分卷者47册；1923年至1940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二编，共69种133卷。另编定31种待刻，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云南丛书》的编辑刻印工作中止。历时26年编刻的《云南丛书》把保存下来的历代云南重要地方文献网罗殆尽，是云南有史以来地方文化的一次最系统的总结，对云南的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术创新的根基是学术积淀和传承。从编辑刻印《云南丛书》之时

算起至今，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云南的学者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为云南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今天，文化建设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整理和出版云南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优秀成果，是继承优秀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我们才看得更远，走得更实。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云南文库》的初衷。

比之编刻《云南丛书》的时代，云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不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边疆省份，而是成为了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云南的文化创造力也大大发展了，学者力量的壮大、学术成果的丰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云南文库》不可能像当年《云南丛书》一样收录所有的文献资料，只可能是好中选优、优中选精，尽可能地把最能体现云南学术文化水平和云南学术特色的成果收录进来，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和传承文化，弘扬学术，促进今日云南文化学术的建设与繁荣之目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云南文库》分为三个系列。

一是《云南文库·学术大家文丛》，收录云南学术大家的作品。

二是《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出生的云南学术名家的作品。

三是《云南文库·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的优秀作品。

我们将使《云南文库》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不断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云南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云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1年6月

导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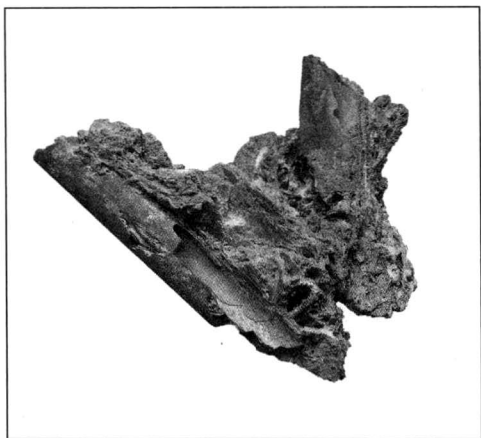
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我们会发现一种奇异的现象：竹这种自然植物渗入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竹为材料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菜肴、药膳、交通工具、书写工具、建筑物、乐器、工艺品、舞蹈道具等器物，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以竹为歌咏、描绘对象的文学、绘画作品，层出不穷，美不胜收；以竹为崇拜物、理想人格象征物的巫术宗教事象和伦理事象，屡见不鲜，俯拾即是……竹在中华文化中远非一般的纯生物意义上的植物，而是“人化”了的自然，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情感、观念、思维和理想等深厚的文化底蕴，构成一种反映与体现中华民族内在精神的外化形式的文化景观，一种传达与表现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宗教精神、人格理想的文化符号。

一、中国：竹的故乡

在植物世界中，竹子既非草也非木，只因其花与稻稷相同，“结实如麦”，所以植物学家把它列入禾本科，并在禾本科大家族中命名为竹亚科以示区别。竹有木质化或长或短的地下茎，竿亦木质化，有明显的节。节间常中空。主竿上的叶缩小，无明显的主脉，普通叶片则具短柄，且与叶鞘相连处成一关节，容易从叶鞘脱落。竹类根系发达，繁殖快，成材时间短，适应性强，速生丰产。竹材力学强度大，弹性好，耐磨损。

中国是世界上竹类品种最多的国家，有 30 多个属，300 多个种，而且分布广泛。东至台湾、南至海南、西到西藏纳宗以南地区、北到黄河流域，历史上均曾为竹类分布区。在上古时期著名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山经》中，除南山经外，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皆记载到竹，言“多竹”竟

达 21 次之多，足见竹子在上古分布之广、资源之丰。后因拓地、兵燹、横征暴敛、自然灾害等原因，“淇水流域的大片竹林到南北朝时已不复存在了；渭河平原及秦岭北麓的绿竹到明清时期即已显著衰败；至于太行山脉南段之中条山等地，到清末时，成片竹林已经难以寻觅”^①。北方地区竹林毁损。但直至今日，在福建、湖南、浙江、四川、江西、安徽、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南、陕西、江苏、台湾 14 个省（区），茂密的竹林随处可见，不乏像四川省江安、长宁两县交界处的“蜀南竹海”——万岭箐一样修篁茂密、莽莽苍苍、形若大海的“竹海”。



竹化石 [出土于云南龙陵] (黄文昆摄)

中国是公认的世界竹类植物的起源地和现代分布中心之一，堪称“竹的故乡”。

二、竹的人化：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

在人类诞生以前，竹类植物与整个自然界一样，处于“自在”的状态之中，为“自在”之物。“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实践“母亲”的“孕育”下，在这个世界上呱呱坠地之后，一改动物界对待自然的消极、被动、盲目的态度，开始按照自身的各种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中，人类不仅认知了世界、改造了世界，而且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新型关系，在自然之上深深地刻铸下人的印迹，使自然由“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成为“人化”了的自然，人的

^① 古开弼：《从我国北方竹类的历史分布看“南竹北移”的广阔前景》，《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本质力量也在自然之中得以显现和“对象化”，天人之间的双向交流赋予自然以人的特质，

同时促使人类自身不断“提升”^①，即“人化”。黑格尔曾说：

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人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②

人类的产生，使自然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人化”了。

竹在中华民族祖先的实践过程中与整个自然一样，被逐渐“人化”，进入到人的生活之中，被利用为延长人的身体器官之物，加工、制造成各种各样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中国从远古至今对竹的开发利用过程就是竹的“人化”历程。

中国是开发利用竹类资源最早的国家之一。据考证，距今一万年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人类就已经开始栽培和利用竹类了^③。而在北方地区，公元前6080~前5600年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即有竹鼠遗迹；公元前2800~前2300年的山东历城龙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竹炭和形似竹节的陶器出土；在河南殷墟遗址中，不仅发现了竹鼠遗迹，而且出土了有“竹”、“箴”、“箒”等字样的甲骨卜辞，可见竹子在殷商时期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据考证，殷纣王曾在淇水沿岸的“淇园”设竹箭园，并设专官管理。

至西周时期，竹材被大量利用，并有了“籥篴工”职业，用竹制作成“竿”、“笈”、“簞”、“笄”、“筐”、“箕”、“筵”等竹器。到秦朝，有所谓“渭川千亩竹……其人皆与千户侯等”^④之说。汉朝则设“司竹长丞”职官，

①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该文认为人真正彻底脱离动物界，经历了两次“提升”，第一次“提升”使人“从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第二次“提升”则“在社会关系方面指导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

②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9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③ 参见张之恒：《中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④ 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专门管理竹林，足见其时竹材利用程度之广。晋朝，我国已开始用竹材造纸，这是世界上利用竹材造纸之始^①。南北朝时期，竹材管理梁朝归大匠卿，北齐归大匠，北周则归司木中大夫。隋朝沿北周旧制，竹材管理在司木中大夫下设专官掌管。

唐朝初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竹材的需求量大增，将作监内设有管竹材专职官员，司苑内有上林署专司竹木栽培。宋代的将作监更为庞大，下属有三十一作，竹作规模宏大。《金史·食货志》载：“司竹监岁采人破竹五十万竿。”^②可见其时竹材加工之盛。元朝统治者实行竹材专卖，朝廷专立司竹监掌管，“每岁令税课所官以时采斫，定其价为三等，易于民间，至是命凡发卖皆给引，每道取工墨一钱；私贩者，依刑法治罪”^③。明朝专设“竹木坊”管理竹木交易，变竹材朝廷专卖为自由买卖。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置上林苑监正七品衙门内属四署，其中林衡署管竹木。^④

随着中华民族实践活动的发展，竹的“人化”和“文化化”的程度不断拓展与加深，由文化的显层面逐渐深入到文化的隐层面，满足着中华民族的生理（生存）、安全、社交、尊重、求知、审美、自我实现等不同层次的需要。在生产工具方面，起初竹用于制造简单粗糙的挖土、播种农具和狩猎、打猎工具，其后人们对自然的加工深度和复杂度渐趋加强，适应生产的这一需要，竹被加工成纺织机、制盐器具等较为复杂的生产工具；在生活用具方面，竹由制造粗糙的筷子、盛器等浅加工向编制精致的席、扇、家具等深加工扩展；在饮食方面，竹笋由充饥之物向制作精细的山珍佳肴和驱病滋补的药膳发展；在建筑方面，以竹为材料的建筑物由避野兽御寒冷向审美观赏进化……在中华文化演进的历程中，竹由器物文化向观念文化扩展，内化、隐化到人的心灵深处，幻化成敬仰、崇拜、祈求等巫术、宗教的崇拜物，成为艺术家寄寓情感、理想的审美对象，人格化为思想家体现理想人格的象征物。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

① 南京林学院竹类研究室：《关于北方发展竹子的生产问题》，《中国林业科学》，1978年第2期。

② 《金史》卷49《食货志》。

③ 《元史》卷94《食货志》。

④ 参见古开弼：《从我国北方竹类的历史分布看“南竹北移”的广阔前景》，《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① 竹文化由器物文化向观念文化的内化过程亦呈现为事实的这一演进序列。

竹在精神文化领域，摆脱了人的直接功利目的，获得“无目的的目的性”，直接表现了中华民族炽热而虔诚的宗教情感、清淡逸远的审美趣味、坚贞而有韧性的人格理想及其文化意识。此时，竹的物质形态隐化和符号化，中华民族“自主意识”却得以显化和强化，竹演化为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符号，彻底地变成“为我之物”。

三、竹之所以成为文化：外延的普泛性与内涵的内在化

竹渗透到了中华民族整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房屋建筑、交通工具、书写工具、工艺美术、乐器到巫术宗教、文学绘画、人格伦理，无不可见到竹的身影。被称为文化人类学之父的泰勒指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② 即文化的外延包含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竹正是涉及中华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的一种事象。从“文化”的外延方面审视中华民族生活中的竹，它是一种文化事象。



黄金间碧玉 [云南陇川] (黄文昆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英]泰勒：《原始文化》第1页，蔡江依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不仅如此，在竹这种植物上，中华民族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的认识与理解、创造的智慧与能力、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情感方式与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吃竹笋不仅仅为果腹，而且更为了怡情，“饱食不嫌溪笋瘦”、“无竹令人俗”（苏轼语），“服日月之精华者，欲得常食竹笋。竹笋者，日华之胎也”^①；竹冠不只用于遮阳挡雨，或为帝王“祀宗庙诸祀则冠之”的“斋冠”，或为隐蔽锋芒、外圆内方人格的代表，“竹冠草鞋粗布衣，晦迹韬光计”^②，或为文人淡泊世事、坚贞不屈的表现，“凌霜爱尔山中节，暇日便吾物外游”^③；竹杖除了扶助人们登高履险、支撑身体平衡外，还可用作丧葬之具和表达生活志趣，“竹圆效天，桐方法地”，“竹外节，丧礼以压于父”^④；以竹材建造居室，显示出中华民族“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⑤的自然观和建筑思想，并表现了中华民族尚俭归朴、怡情自然的情怀，“傲吏身闲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楼。南风不用蒲葵扇，纱帽闲眠对水鸥”^⑥。以竹为材料的竹制工艺品、咏竹文学、写竹画、竹图腾和神祇、象征理想人格的竹，则更为直接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内倾细腻的情感类型、“比德”的类比思维形式、阴柔和谐的审美理想、轻教义经典重宗教履践的实用理性宗教精神、凌云浩然之志和淡远自然之趣并重的人格追求。因此，可以说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

总之，中国人生活中的竹，既普及及人类生活诸领域，又内化到以价值观念为轴心的精神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中华民族生活中的竹为中国竹文化。这是本书立论的基本理论前提和出发点。

四、中国竹文化的内容：竹文化景观与竹文化符号

许多学者常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来划分与归类文化。这一文化分类模

① 张君房：《云笈七签》卷23，《日月·食竹笋》。

② 王仲元：《江儿水·叹世》。

③ 陈确：《竹节冠成戏用前韵》。

④ 陆佃：《埤雅》卷15。

⑤ 《梁思成文集》（三），第1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

⑥ 李嘉祐：《寄王舍人竹楼》，见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卷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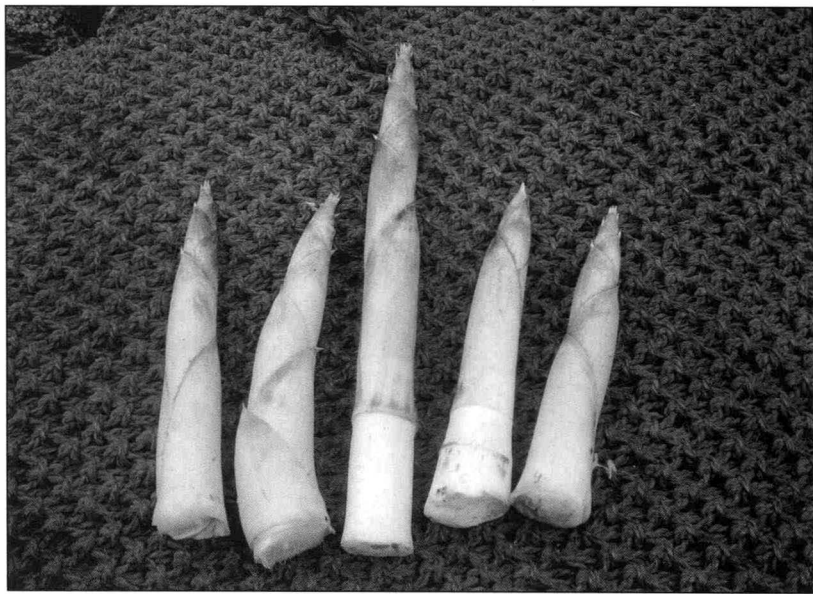
式用于划分中国竹文化，则有诸多抵牾难通之处。如竹制书写工具、工艺品、乐器、舞蹈道具等，从其功用的角度看，均服务于人们的精神活动，属精神文化的范畴，然而竹在其中仅只是构造材料，是物质生产的产物，并且不直接表达人的精神内涵，不是精神活动的结果，故而从竹的角度看，不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同时，这些竹制器物又用于精神生活领域，归入物质文化亦欠妥帖。但是，它们却是与竹笋和竹制日用器物、生产工具、建筑、交通工具等一样能显示出文化性的人化了的自然，或者说是中华民族为了特定的实践需要而有意识地用竹所创造的景象。同时，饮食、日用器物、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建筑、书写工具、工艺品、乐器和舞蹈道具中的竹，与巫术宗教、文学绘画、伦理规范中的“竹”全然有别，后者本身即直接表现与象征着人的情感、思维、观念、价值、理想等精神世界，前者无非是构成器物的物质材料而已，文化内涵的显示不是竹本身而是竹所构成的器物及其使用规范。前、后两种竹文化事象有很明显的畛域，当然这种差别不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异，而是文化景观与文化符号之别，前者为竹文化景观，后者就是竹文化符号。这是本书设置上、下两编的理论依据。



绿色长堤[云南陇川](黄文昆摄)

竹文化景观是指人化了的竹所显示出来的中华文化性质，或者说是中华民族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生产需要、书写需要、审美需要等有意识地用竹创造的景象。竹文化景观既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心理倾向和特点，又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进化的程度。竹作为竹文化景观的构成要素，是物质的，但它所展示的效果却是精神氛围性的，是中华民族内在精神的外化形式。

食笋是中国竹文化景观构成部分之一。吃，本为人与动物的共同本能，但由于人除了具有生物性之外，尚有社会与文化的规定性，因而人的吃形成了一整套动物所没有的“吃法”——饮食规则和禁忌，从而赋予人的吃以文化的底蕴。据《诗经》、《禹贡》等文献记载，竹笋至迟在西周时期即已成为佐餐佳肴，此后相沿不衰，直至今日，竹笋仍然不失为中华民族的桌上名菜。在古代，竹笋不仅为寻常百姓果腹，而且是王公贵族的席上珍馐；不仅为世俗凡人独享，而且是宗教僧侣的重要菜肴和祭献祖先、鬼神的祭品。在普遍而持久的食笋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完备的竹笋烹饪和加工技术。竹



笋竹笋

笋有烤（烧）、煨（炖）、蒸、熬、炸（炮）、焯、炒、焙、爆等多种烹饪方式，正如《齐民要术》所云：“蒸煮焦酢，任人所好。”在中国南北食谱中，

以竹笋烹调出的名菜多达一百余种，其中有：贻金煮玉、笋蕨馄饨、山海苑、胜肉铗、鸡茸金丝笋、茄汗冬笋、水笋焖黄豆、玉兰春笋、玉兔入竹林、蝴蝶冬笋等。竹不仅可以充饥果腹，满足口舌之好，而且被赋予浓厚的文化内涵，倾注了重农耕文化的中华民族对于植物格外厚爱的感情，寄寓着前喻文化中前辈和晚辈关系的伦理价值及对天人关系的理解。竹制日常生活器物是中国竹文化景观构成部分之二。日常生活器物为人的创造物，其材料的择取、制作的工艺程序、形状和大小都体现了创造者和使用者的情感、观念、思维和价值。竹材被中华民族大量运用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物。竹制炊饮器具有：竹簋、竹篮、箬、笱等商周时期祭祀和宴飨的食器，竹甑、蒸笼、箨滤、笕箕、竹釜等饮具，竹盘、竹碗、竹桶、竹筒、竹筒等盛具，竹筷、竹勺等餐具，罗、合、建城、笛、茶匙、竹荚、茶笼、竹茶囊、都篮、茶焙、竹炉等竹制茶具。竹制服饰有：竹冠、竹帽、笋鞋、竹屐、竹簪、竹耳环、竹发圈、竹腰圈、秧箩等。竹制消暑用具有：种类繁多的竹席，放于床上或榻上供人凭靠憩息、祛暑祈凉的竹几（又称竹夫人），制作精细的竹编扇和竹骨扇。竹制家具具有：主要以斫削竹材而成的竹床、竹榻、竹椅、竹凳、竹案、竹桌，主要以编织竹篾而成的竹笥、竹篋、竹箱、竹帘。玩具有竹马、竹蛇、风筝等，还有筇竹杖、斑竹杖、方竹杖等各式各样的竹杖。竹制日常生活器



竹扇（董文渊摄）